

何以“中华未能？” ——论中西文化交映下的郑观应慈善公益思想

陆文学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 中山 528400]

[摘要] 今日中国慈善公益事业存在的问题其实是历史问题的延续,当今中国慈善公益状况固然比晚清郑观应所看到的状况大有好转,但性质上的根本改变似乎并没有发生。就郑观应而言,我们仍然能从他的慈善公益思想中体察到问题的根本所在。他所强调的政府与富人应当承担责任的理论值得今人学习,其思想富有现实意义。郑观应该得到更高的评价。

[关键词] 郑观应;善举观;国家富强;泰西;盛世危言

[中图分类号] D6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105(2012)02-0096-07

就其所反复论及的慈善公益思想,尤其是《盛世危言》一书中的善举观来说,作为近代中国卓越的启蒙思想家,郑观应在今天仍然能让我们看到他的那些思想对我们现实生活的启示,我们甚至可以感觉到它在很大程度上能指导中国的现实问题。简言之,就是在中国这个政府力量一直强大的传统国家,政府理应承担更大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的义务,且要教养兼顾。如此国家才能体现富强,或者说方能走上富强。

由于各种各样的历史原因,直到今天,中国的社会保障水平仍然很落后,需要得到保障救济的人群比例在我国仍然相当高。从传统思想的资源中寻找与现代社会能够结合的地方,致力于中国社会的建设是可行的。郑观应的慈善公益思想及其实践就有这样的宝贵性,可以说是与当前中国国情相符合的具备社会保障和救济措施理论性与实践性的资源。和西方国家相比,晚清中国社会保障和慈善公益的落后源自于政府不仅没有承担应该承担的责任,而且也没有培育民间慈善公益组织的发展。用郑观应的话来讲就是:(当时)“夫泰西各国乞丐、盗贼之所以少者,岂举国皆富民无贫民哉?好善者多、而立法褊密,所以养之者无不尽,所以恤之者无不周耳。迹其意美良法,实有中国古人之遗意。”^{[1]528}郑观应看到了中国社会贫困问题的根源,希望中国

能够学习西方的先进做法,再现历史上“三代”时的辉煌。

目前国内已经有一些研究论及郑观应的慈善公益观,也有以“郑观应的慈善观”为题的学位论文,试图系统地论述郑观应这一方面的思想。总体上来说,这些研究都能够注意到郑观应的慈善思想,社会福利思想的具体内容。但不足之处是缺乏理论高度来观照郑观应的慈善公益思想的时代价值,甚至对郑观应善举思想做出较低的评价^[2-5]。其实,如果我们用秦晖先生的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大共同体亢进,小共同体衰弱的理论^[6]来看待郑观应的慈善思想公益观,我们会发现郑观应实际已经看到了自秦以来,中国统一王朝这个大共同体对人民提供社会保障严重不足的弊端,也就是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极度缺乏。秦晖先生所言的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追求行政安全的目的远远胜于追求行政正义目的的社会是上述问题的原因所在^[7]。因此当了解到“泰西”的仁政之后,郑观应自然会流露出欣羨之情。和泰西“纵城市间有乞丐,必须手摇风琴,或握鲜花,或持自来火以为赠遗。虽一望知为乞钱者流,亦觉有所籍手,而衣服完整,绝无污秽面孔以取憎于人”相比,“我中华未能也”。^{[1]534}郑观应看到的是除租界外,中国都市到处都是“丐食游民三五成群,或强行乞讨,或将烂腿病足显露在外”^{[1]533}以博得路

[收稿日期] 2011-07-07

[基金项目] 广东省社科联地方历史文化特色项目“中西方文化交映下的善举——郑观应的公益事业思想(善举)与实践”(2009-DF-03)。

[作者简介] 陆文学(1971-)男,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孙中山研究所教师。

人之同情,没有一点尊严的景象。“泰西”的乞丐讨饭都讨得有尊严,怎能不让生活在号称天朝上国的中华子民郑观应发出浩叹呢?所以,郑观应在《盛世危言》的很多篇目中都论及中国政府应该学习“泰西”,做很多应该做而没有做的事情的内容,承担自己的责任。“泰西”的仁政深刻影响了郑观应,并对其慈善公益思想直接产生作用;而作为一个有着强烈爱国心的中国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义至上价值观在他身上又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因此客观理性地吸收“泰西”文化,而又以地道的中国文化作为其表述的根基是郑观应启蒙思想的根本特点。

在中西方文化的交互影响下,郑观应表达了至今对中国仍有参考意义的以促进国家富强为根本目的的慈善公益思想(含社会保障、社会救济等内容)。需要指出的是,郑观应所处的时代的特性,也即传统中国的社会保障空而无力是我们认识郑观应慈善公益思想的一个基础,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客观地评价郑观应这位中国近代史上可谓先知先觉的启蒙思想家的各种观点,客观地看待其处在特殊时空背景之下的慈善公益思想。本文试以《盛世危言》“善举”篇为中心来论述中西文化交映下的郑观应慈善公益思想,将其放在传统中国的社会公益事业严重缺失的脉络中探寻其历史和现实的意义。

一、郑观应视野中的中国慈善公益状况

在郑观应眼中,晚清的中国是这样一幅图景:“我中国除租界外,无处不有丐食游民三五成群,非强丐于市前,则烂足卧病于街道。”而“朝廷不知民间疾苦,以为有养老院、恤嫠局、育婴堂,可以野无饿殍。当道以事谄诸绅士,视若无足轻重;绅士又从而染指其间,占为利藪。至如富绅巨室虽积产数十万至数百万,决不肯行一善举;一朝命尽,金银不能携带于九原,只可供子孙挥霍耳。宜其为西人所讥笑。来鬼物之挪揄也!”^{[1]533}而“今日之僧道只知建醮超幽,敛人财物,未闻有行一善举如耶稣、天主教士设学校以教人,创医院以治疾者。……”^{[1]538}“余见上海租界街道宽阔平整而洁净,一入中国地界则污秽不堪,非牛溲马勃即垃圾臭泥,甚至老幼随处可以便溺,疮毒恶疾之人无处不有,虽呻吟仆地皆置不理,惟掩鼻过之而已。可见有司之失政,富室之无良,何怪乎外人轻侮也。”^{[1]663}

从上述引文中可以看出,一方面,郑观应表达了对朝廷及各级官员的不满,因为“有司失职”,国家(政府)不作为,使得本来就不多的养老、恤嫠等公益机构被唯利是图的绅士“占为利藪”,不但不

能发挥社会保障救济作用,反而成为少数人牟利的工具^{[1]533};一方面他又看到中国缺少慈善家,很多有钱人宁愿做其他无用的事情,也不肯“收恤茆独。”^{[1]937}而作为宗教的佛道两家更是不能和泰西的耶稣教做善事相比。泰西的基督教不仅创设学校,还建立医院进行诸多社会建设工作,中国的僧道则不仅没有发挥宗教该有的济世功能,反而以敛财为根本任务。总之,中国在诸多方面甚至可以说全方位都不如和上古中国“三代”相仿的“泰西”之仁义。

表1 郑观应眼中的中西慈善公益之差距

| | 乞丐盗贼情况 | 政府作为 | 社会组织作为 | 富人作为 | 法制保障情况 |
|----|-----------------|--------------------------|------------------------------|--|-------------------|
| 泰西 | 乞丐盗贼少 | 政府知道失业游民过多,天下会乱,故有众多有效措施 | 民间组织诸如基督教教堂能够向社会提供教育、医疗等公益服务 | 好善者多,有富翁积财数百万,尽行拨作各种善举 | 立法严密,乃美意良法 |
| 中华 | 乞丐盗贼多,穷民塞途,黑索褐衣 | 朝廷不知民间疾苦,虽有一些善堂,但大都经理不善 | 也有寺院道堂,但只建醮超幽,敛人财物,未闻有行一善 | 好善者少,民智未开只知为子孙做牛马,富绅巨室虽积产数十万至数百万,绝不肯行一善举 | 只有古代有规制法度,今未能(有)也 |

二、郑观应慈善公益思想之出发点

在上述的图景下,强烈希望中国富强的郑观应“一腔热血,罔识忌讳,用成‘危言’一书,藉作旌木之献。……”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通过著书立说,阐发强国之思想,希望朝廷、有司(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能够承担起自己应尽的责任,学习西方,以图中国之强大、文明。按郑氏自己的说法,就像医生给病人开药方:“以期天下共知病源所在,毋讳疾而忌医,毋畏难而惮改,则大局庶有豸乎。”^{[1]23}

郑观应慈善公益思想的出发点是与其《盛世危言》所体现的总体思想目标相同的——即通过改革使中国变得民富国强。民富是郑观应孜孜追求的目标,也是其认为国强的手段,这是他最值得今天我们称道的地方。这样的出发点显而易见是郑观应目睹中国被西方列强欺辱,而西方在社会内部又比中国做得好的实际情况使他受到强烈刺激所致。从对《盛世危言》的重要篇目“善举”篇多次增修,而且又在其它篇目,如“僧道”、“狱囚”、“教养”、“户口”中提及办恤贫院、工艺院等包含善行等社会保

障的内容可以看出郑观应公益慈善思想的富民强国目标。

《盛世危言》是郑观应在其旧作《易言》的基础上重新修订改写的,而《易言》又是郑观应在其第一部著作《救时揭要》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在《救时揭要》一书中,郑观应针对民间游民问题写下《拟设义院收无赖丐人使自食其力论》一文。这篇文章已经表达了要保证社会长治久安,必须清内患、固邦本的意识,而且教养并重的思想已经清楚体现。郑观应认为避免内患,诸如“游手好闲、饥寒者众,或三五成群,昼伏夜动,或拜会联盟,肆行抢掠”,就必须以民为本,开办慈善事业。他提出的办法是“曷若费百万之资,并令各省富绅捐助不足,每省设一栖流局。拣举能员立为总办,广置田产,大屋千间,收无赖丐人,或使之耕,或教以织”,“俾令自食其力”。如此,则社会安宁稳定,“病有所托,贫有所归。”^{[1]534}这其实就是政府应该有义务负起责任,解决那些失业游民的生计问题。用今天的话就是政府应该想办法解决失业,降低失业率,以维护社会稳定。此时的郑观应关心更多的是如何让已经风雨飘摇的大清王朝稳住内部,平稳发展。

但是到郑观应决定撰写《易言》的时候,大清王朝面临的外部环境就开始变得严峻多了。郑观应说其写作《易言》的原因是:“庚申之变(指1860年,即清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烧毁圆明园,咸丰帝逃往承德避暑山庄,最终被迫签订《北京条约》,对列强作出巨大让步这一重大事变),目击时艰,凡属臣民,无不眦裂。每与酒酣耳热之下,闻可以安内攘外者,感触于怀,随笔札记。”^{[1]173}可以看出写作《易言》的郑观应在提到政府保障人民的时候,主要目的是为了强国。到后来修订《易言》成《盛世危言》一书,郑观应直接挑明政府必须对失业游民负起责任来,否则对整个国家安危而言后果都会相当严重:“天下作乱之源,往往因失业游民乘饥蜂起。盖年丰则生计稍宽,衣食赖以粗给。岁歉则流离失所,壮者必四散诸四方,既不自为盗贼,必为匪党胁诱。天下能无乱乎?”^{[1]534}

1893年,应上海格致书院山长王韬之聘,郑观应为该书院学员命题,其中便有善举的题目。从题目内容可以看出郑观应的慈善公益思想之目的。他说:“泰西善举甚多,除育婴、施医、禁酒、自新、恤孤、劝和、训哑、教聋等会外,又有恤贫院:凡丐食街市及无业游民,收入院中,教以浅近手艺,至期艺成得以自养。诸院有设自国家者,有捐自官绅者,每岁所集经费自十万至数十万不等。窃思古者发政施仁,凡有鳏寡孤独、穷民之无告者,皆在

所矜恤。然则恤贫院亦当今急务,不悉当道与富绅能立此功德否。应若何筹款?其章程如何始能悉臻美善?请切实指陈,以备采择。”^[8]中国穷民能够像泰西一样自养,“凡有鳏寡孤独、穷民之无告者,皆在所矜恤”是郑观应善举观的根本目标,他给学生出题目就是让学生思考如何在中国发展慈善公益事业。郑观应希望学生能够考虑在中国属于当务之急的恤贫院如何运作筹款,如何制定章程,如何进行管理运行等公益事业具体问题。他是把这个慈善公益看成重要议题来对待的。

归根结底,郑观应的慈善公益思想目的非常明确,除了对贫民的同情、救灾民于艰难困苦之外(施仁政),还有一个目标就是强国,他希望政府能有所作为,在慈善公益事业上做工作以保持国家长治久安之秩序,安内而攘外。

为了能达到上述目的,郑观应表达了以下的见解,这是他慈善公益思想的主要内容。

三、郑观应慈善公益思想的核心内容

(一)对“穷民”国家(政府)当承担更多的公益责任

郑观应认为当时中国“各省穷民仍多无所归者”的主要原因是政府根本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他的分析是:“近(国家)虽设有栖流所、施医局、养老院、育婴堂诸善举,然大抵经营不善,款项不充,至各省穷民仍多无所归者。”结果不仅如此,还导致(穷民)“小则偷窃拐骗,大则结党横行,攫市上之金钱,劫途中之行旅。”对这种情形,郑观应的观点是:国家必须进行应尽的社会保障工作:即“亟宜设法扩充(善举),官绅合力,令世家、贵族、富户、殷商酌量捐资,广为收恤,城市乡落遍立善堂。所有款项遴委本地公正廉勤之绅士实心经理,酌定章程,章程仿善堂,岁刻征信录。多置田产,藉供舒粥,广葺厦屋,俾免风霜。所有无告穷民,各教以一工一艺,庶身有所寄,贫有所资,弱者无须乞食市廛,强者不致身罹法网。少年强壮之夫,则官为资给,督令垦荒,国家可增赋税。所谓一举而数善备者,此也。”^{[1]525}郑观应明确说明政府应该想办法扩充善举,承担更多的公益责任,不管是设立善堂,还是教授贫民以技艺等。郑观应认为中国政府做得不好,在随后文中,郑观应列举了很多“泰西”国家的慈善公益举措,大加赞赏,希望中国政府积极学习。

至于办慈善公益需要经费,而“款项无所出”的问题,郑观应希望政府应该有所举动予以解决。

他的观察是,中国民间社会并不少用以慈善的资金,但钱财全用到了没有意义的地方。所谓“夫中国各埠,每岁迎神赛会敛资辄至万千,举国若狂,动辄肇事。何如省此无益之费,以教养贫民乎?佞佛斋僧,布施或倾家业,奸僧淫赌,徒为祸媒。何如留此有用之财,以收恤茆独乎?”^{[1]528}这里至少透露出两个郑观应看到的问题,一是中国的“迎神赛会”等民间信仰活动没有承担起诸如基督教等西方宗教的社会救助作用;二是佛教这个在唐宋期间曾有大量慈善公益活动的宗教在清代其公益活动已经很衰落,僧徒聚敛了很多财富,却没有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比如教养贫民。基于对晚清佛道表现的认识,郑观应甚至提出了将寺院改为恤贫院的建议:“其(指僧人)年老力衰、多病残疾、幼弱未成丁者,改各州、邑大寺为恤贫院以处之”。^{[1]538}

在《盛世危言》“教养”篇中,郑观应发出了“收养穷民”的呼吁:“今日之计,宜废八股之科,兴格致之学,多设学校,广植人才,遍兴工艺厂,收养穷民”。为了使穷民能有一技之长,则要“以人事补天工,役天公于人事。”^{[1]481}在考虑贫民这些这些社会弱势群体问题上,郑观应总是孜孜难忘。他说:“中国向无工艺院,故贫民子女无业谋生者多。倘各处设院教其各成一艺,俾糊口有资,自不至流为盗贼。”^{[1]267}国家有责任承担自己国家的公民拥有谋生技能之呼吁跃然纸上。

在《盛世危言》“狱囚”篇中,郑观应提出这样的建议:“今为化莠起见,莫如于监狱之外,另设工艺学堂。凡犯罪监禁之人,教以学习工艺,……其所作之工,给予俸值,代为存留,俟罪满释出之时,全行给算。则蚩蚩之氓计工得值,技以精而可恃,心以感而知新。是被禁之时不啻代为造福,予以业而奠基也。”^{[1]510}用现在的话来说,就对越轨的社会成员再社会化,是化害为福的政府行为,当然这还是政府要做的事情。郑观应希望政府通过工艺学堂的设置,使狱囚出狱后有一技之长,且能“心以感而知新”,重新返回社会,能够自食其力,不再危害社会。如此的目的是:“国无游民,人无废事,将见百亿蒸蒸,民之幸,亦国之福焉!”^{[1]511}富民强国之目的灼然可见。

对于乞丐,郑观应强调了政府必须承担的管理职能。在《盛世危言》“户口”篇中,他说:“至于乞丐另为编册,酌给庙宇或公所,责令丐甲查点。日间任其行乞,夜必一律归宿。如不归宿,即行驱逐。丐甲不察,有事连坐。以上分为稽核,而总其成于警察署。由警察署会同地方官,或按月,或按季递申疆吏,而达之政府。”^{[1]472}政府为了维持良好

的社会秩序,必须对行乞之丐进行积极有效管理,而提供庙宇或公所等住宿之地则是首先要做的,这实际就是今天政府的社会保障、社会救济工作,如同今天中国各地民政局设置的为流浪者等无家可归者暂时留宿的地方,比如各地存在的救助站等机构。

在郑观应眼中,西方国家为他的人民做了很多事情,“泰西各国政府知其事有所必至也。于是广辟商埠以浚利源,多开矿务以资人力,觅新地以赡贫穷,兴制造以裕器用。择地多造花园,听民游览,以舒其郁塞之气。广兴曲局,令人领会,以导其心气之平。”^{[1]534}很多都是中国政府“未能也”的行为,中国政府理所当然要学习。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郑观应的慈善公益观点很明确:中国政府必须承担起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责任,必须提供必要的慈善公益服务。中国要学习很多“泰西”已经做、正在做的公益事业。

(二) 希望国人多行善举,出更多的慈善家

基于对西方的了解,郑观应对“泰西”慈善文化的“仁义广布”非常羡慕和赞赏,同时又对中国社会缺少慈善习俗和慈善家深感不满。所以他利用各种机会宣传做出大量慈善公益实业的“泰西”之仁义,对中国人不断进行劝善,盼望中国能多出慈善家。他自己则身体力行,积极投身于赈灾之善举行为之中。

郑观应比较中西各方面的之差异后,非常感慨:“泰西各国以兼爱为教,故皆有恤穷院、工作坊、养病院、训盲哑院、育婴堂。善堂之多不胜枚举,或设自国家,或出诸善士。常有达官富绅独捐资数十万,以创一善事。西人遗嘱捐资数万至百数十万者颇多。闻英人密尔登云:英国有富家妇,夫亡遗资甚多,其创立大小学堂、工艺书院及置穷人贩卖零星物件之地,共费银一千五百万磅。中国富翁不少,虽身受国恩,而竟未闻遗嘱有捐资数万至数十万创一善事者,宁愿留为子孙花费,殊可慨也!”^{[1]525}对不行善举的富翁们,郑观应进行了劝进式的嘲讽:“至如富绅巨室虽积产数十万至数百万,决不肯行一善举,一朝命尽,金银不能携带于九原,只可供子孙之挥霍耳。宜其为西人所讥笑,来鬼物之揶揄也。”^{[1]533}或直接讲道理:“大厦千间,夜眠八尺。良田万顷,日食一升。”“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积钱于子孙,子孙未必能守。积书于子孙,子孙未必能读。惟积德于冥冥之中,可使子孙受用无穷。”“中国民智未开,只知为子孙作马牛。尝闻有积蓄金银无数埋于地中,竟为贼所劫。亦有守至贼兵入境,如李闯所为迫勒财尽身亡。请富翁深详思之。”^{[1]534}同样是为了使“子孙受用无穷”,郑观应对富豪的劝

诚是：积德散财。

郑观应目睹中国到处是“丐食游民三五成群”的情形，深感痛心，对各省因民间信仰活动（各种赛会，如游菩萨、神灵寿诞祭祀）而浪费大量财富又不满。他认为应该把那些花在无用之处之钱财用在做善举这样的有益事情上。“呜呼！耗此费者，年中不知几许。以有用之财，作无益之事。何如集资效范文正公之创义仓、开义学、设育婴堂、收埋路尸、舍药施医，利民利物，作方便阴功，足以邀天之佑乎？若无救济之功，而徒费资财，欲邀冥福，是未耕而求穫耳。鬼神在天之灵，亦悯世无知，开鸾降乩，劝人为善，修身为本。无奈世人迷而不悟。有心世道者宜出示严禁，开导愚蒙，使省梨园神会之资，改作济世救民之事，岂不善哉！”^{[1]35}

从郑观应对当时中国慈善公益的记录和评价来看，当时的中国公益事业实在微不足道，民间公益组织也很不发达，确实需要郑观应这样的启蒙思想家奔走呼唤来促进发展。同时我们还要思考，何以郑观应面临的中国就不如“泰西”那样，出很多慈善家，政府主导的公益事业又发达呢？当时的郑观应没有做深入研究，只是认为中国民智未开，朝廷不知民间疾苦，富人不愿做善举造成穷民众多而无告的原因。但秦晖先生则认为，宋以后中国的社会福利走下坡路源自于（至少在相当程度是因为）宗教公益事业日益受到皇权的制约，而国家又没有提供应该提供的福利保障^[6]。或许清代人口急剧增加也是国家公益不足的原因，但人民不能自由结社，小自治群体被严重压抑，人民呈现一盘散沙的状态才是互助、公益缺乏的真正原因。如果了解这样的历史背景，我们才能客观评价郑观应组织劝善会、呼吁政府加大投入、全力承担的慈善公益思想其正当性和可操作性。

四、如何评价郑观应的慈善公益思想

目前郑观应慈善公益思想研究最为细致的当属湖南师范大学学位论文《郑观应慈善观及实践》。作者从郑观应慈善思想渊源，慈善思想内容，慈善实践，如何评价郑观应慈善思想及实践等四部分，比较全面地梳理了作为慈善思想家的郑观应的慈善公益思想。总体上来看，作者将很多与慈善有关系的郑观应言论都列了出来予以评述，努力做到对材料的详细分析，十分可贵。但颇为遗憾的是，作为最能反映郑观应慈善公益思想的《盛世危言》“善举”篇却并没有得到作者的重点分析。但《盛世危言》“善举”篇才是真正反映郑观应慈善公益思想的最

重要的材料。

在“善举”篇中，作者开宗明义，直接提出如何保障鳏、寡、孤、独这些今天现代社会也是社会救济主要对象的弱势群体——“穷民”。实际上这些人正是古往今来社会救济、保障的对象。郑观应的善举思想以保障这些人出发点为找对了方向。同时，郑观应强调了国家政府应该在慈善公益事业推广方面承担主要作用，提出了教养并重的观点。他用很多笔墨介绍西方各种慈善团体的活动情况，强烈呼吁清政府要有所作为。总的来说，“善举”篇基本上反映了郑观应的善举观。

慈善有主客体之分，一般总是强势群体（相对于弱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救济帮助，而不是相反。通常情况是国家通过对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来完成“富民”对“穷民”的救济保障。这样看起来政府、国家似乎是慈善行为的主体，其实归根结底，从社会财富的创造者角度来讲，有能力（主要是经济能力）进行慈善活动的群体才是慈善行为的主体，而“鳏寡孤独残病”这些弱势群体则是慈善行为的客体。虽然今天现代社会福利趋向于关注每一个社会成员，但理应是弱势群体的救济保障完成之后，其他社会成员的社会福利才能提上日程。因此可以说，对弱势群体保障救济是慈善活动的根本目标。郑观应的慈善公益思想正是围绕着如解决鳏寡孤独这些“穷民”而展开的。为了使西方事物与中土有效嫁接，从而使中国人易于接受现代观念，和其他人一样，郑观应也主张对鳏寡孤独等穷民的保障在中国“代已有之”，只不过后来不知何因湮没不传了，而学习西方可以使中国回到“三代”的仁义。

正如很多人所看到的一样，教养并重是郑观应慈善公益思想的一大特点，也是晚清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变化，慈善公益思想也为之发生根本转变的表现。这和以英美社会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图景传播到中国有直接关系。

郑观应慈善公益思想深受欧美社会保障救济制度的影响是明显的，他在“善举”篇中，不厌其烦地列举了欧美诸国的慈善公益事业，希望中国学习。最主要的内容之一是使那些弱势人群有一技之长而不成为穷民。晚清那些四处游荡的流民往往是失去土地而无一己之长的贫苦农民，培养贫民的技能也就是在消除或减少“穷民”。教养并重的思想实际包含了国家有责任消除失业人口，保障每个社会成员可以生存下去的含义。

郑观应慈善公益思想的另一特点是强调国家对社会保障救济承担更多的责任。根据秦晖先生的研究，传统中国是一个大共同体力量亢进的社会，国

家几乎在编户齐民的体制下控制了社会的一切, 征税差役的汲取力量极为强大, 社会成员所尽义务非常多, 但与此同时国家承担的保障救济却不成比例, 随着王朝的不断轮替, 中央权力越来越集中, 国家承担的保障救济力度却每况日下。在明清时代国家承担的保障救济力度达到不能说历史最低, 却也非常不尽人意的地步, 穷民四塞以途, 社会矛盾日趋激化。而与此同时, 由于大共同体的膨胀, 管控能力愈来愈强, 民间社会力量则愈来愈弱小, 宗教以及民间组织趋于无能为力, 社会救济功能也就越来越下降。在这种情况下, 郑观应看到了政府没有承担社会功能的严重弊端, 竭力呼吁强化国家、政府的社会保障职能, 从经费筹措、机构设置方面提出了很多建议。

上述内容基本上可以反映郑观应慈善公益思想的特点。那我们该如何评价郑氏的这些思想呢? 在《郑观应慈善观及实践》这篇学位论文中, 作者提出了几点批评意见, 希望能客观地评价郑观应慈善思想。但似乎这些批评意见是站在今日的观点上作出来的, 没有考虑到郑观应生活的时代背景。

第一, 作者认为郑观应善举公益思想是以维护封建统治为目的。这是似是而非的观点。假如郑观应的意见是为了维护满族人永远统治汉族人, 维护皇帝一家或统治阶级的利益, 视人民为仇寇, 那可以说他以维护封建统治为目的。但郑观应是一个民本思想很浓的启蒙思想家, 他是一个极富同情心、具有人道主义思想的士人。他著书立说是为了民富国强, 他所关心的是如何使“穷民”摆脱“无告”, 不再被当成猪仔贩卖, 不再流落街头, 无家可归。最重要的是他理解社会秩序的重要性, 明白稳定是国家富强的基础。如果将维护社会秩序当成维护封建统治则不免容易落入改良无用, 社会发展一定需要进行革命来完成思想的窠臼。

第二, 作者认为郑观应不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而笔者认为郑观应的办法在当时却是最符合中国国情的。我们应该看到“善举”观是郑观应整个改良思想中的一部分, 是与其它思想配套的。郑观应的改良思想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建立议会、兴办教育, 实行君主立宪的国家制度等。这些制度如果能够实施, 那中国很多问题就会容易解决。但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并非以个人意志为转移, 终其一生, 郑观应没有看到他的强国富民的理想实现。历史发展有很多条道路, 选择走哪条有很多因素的制约。我们今天回过头看郑观应的那些想法, 不难发现他的改良社会道路是循序渐进, 而不是“毕其功于一役”的。“毕其功于一役”使“封建”制度被推翻了,

但社会就一定意味着进步, 而人民的生活一定意味着变好吗? 回顾百年中国历史的发展, 我们得到的回答似乎是否定的。因此反思革命与改良孰好孰坏这个命题我们会发现问题并非很简单。郑观应所指的道路或许不是最切合中国实际的根本办法, 但最好的办法又在哪里? 历史并没有按照郑观应希望的道路往前发展, 这不是郑观应的错, 而是时代合力的结果, 因为历史本来就是充满各种变数呈现或然性发展的趋势。

第三, 作者认为郑观应宣传因果报应的思想。从信仰的角度来说, 宣扬因果报应没有什么不对。今天各种合法的宗教诸如佛教宣扬因果报应是很正常的。很简单的道理, 如果相信因果报应的人多了, 社会上的丑恶一定会因为诸人担心报应而减少, 做善事的人一定会增加。但今日的中国人或许太“唯物”了, 敬畏之心缺失, 慈善做的人少, 而打着慈善的名义敛财洗钱者却很多。宗教的作用正是要对此进行强有力的校正, 郑观应的宣传因果报应做法值得肯定。

第四, 作者认为郑观应盲目学习西方, 主要表现在治理河患的问题上。这其实是细枝末节, 仅仅是技术上的问题而已, 不应作为郑观应的慈善公益思想来对待。况且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中国幅员辽阔, 地理环境、气候类型多样, 或许西方的河患治理方式在中国某些地方有用武之地。

其实, 中国“善举”做不好的原因在郑观应看来: 第一主要是国家“投入”严重不足, 这符合事实。既然老百姓给国家承担了那么多的义务, 又没有自由流动、自由对外贸易的权利, 国家当然要予以保护而不能撒手不管。借助西方富强发达国家的实例, 郑观应向清政府发出了进行“教养并重”改革的呼吁。这些呼吁假如放在今天是不是就过时了呢? 笔者以为并非如此。实际情况是很多郑观应的意见今天中国并没有实现。比如“所有无告穷民, 各教以一工一艺”根本就没有完全实现。诸如社会群体的养老、医疗诸多问题还大量存在, 并没有根本解决。

另一个“善举”做不好的原因在郑观应看来是缺乏慈善传统, 慈善家太少, 因此郑观应不遗余力的进行劝善的思想传播工作, 并亲自投身于慈善公益实践的活动中。今天中国社会财富增长迅速, 富豪迅速增加, 但行善的富豪并不多。在探讨这一现象的时候, 排除制度方面的原因, 富豪的信仰缺乏或许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笔者相信, 如果郑观应的“善举”篇中的思想能被拥有大量财富者所接受, 中国今日的慈善活动或许会是另一个样。

五、结语

当初历史没有选择郑观应设计的道路并非意味着郑观应思想的不合时宜,相反,当今天我们回过头进行认真反思,仍然可以提出是否我们走过的弯路与中国没有选择郑观应这样的改良思想有关这样的问题?今天采纳郑观应的意见是否已晚?不管怎样,郑观应的包括慈善公益思想在内的社会改良思想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尤其深刻的启示在于:国强民不富是不是可以号称大国?如果人民过着没有尊严的生活,国家强大意义何在?这正是笔者读郑观应《盛世危言》尤其是“善举”篇之后的心系所在。

参考文献

[1] 郑观应. 郑观应集[M]. 上海: 人民出版社, 上海:

1982.

[2] 李慧伟. 郑观应慈善观及实践[D]. 长沙: 湖南大学, 2009.

[3] 陈国威. 试论郑观应的慈善观[J]. 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 (3): 103-105.

[4] 余新民. 郑观应救助弱势群体的策略分析[J]. 河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 (4): 75-77.

[5] 刘正刚. 郑观应关注弱势群体方行探析[J]. 社会科学辑刊, 2003, (3): 135-138.

[6] 秦晖. 政府与企以外的现代代—中西公益事业史比较研究[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9.

[7] 秦晖. 传统十论—本土社会的制度、文化及其变革[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8] 郑观应. 郑观应年谱长编(上卷)[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 Why Chinese Nationality Could Not ” —On Zheng Guanying’s Charity Thoughts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LU Wen-xue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Zhongshan Institute Zhongshan 528400 China)

Abstract It is continuous problems that exist in present Chinese charity and public services, which have not changed in essence comparing with historical status. In Zheng Guanying’s thoughts, we can perceive the roots of problems from his thoughts on charity and public services. He advocates that the government and riches should undertake more responsibilities, which is of realistic significance.

Key words Zheng Guanying; philanthropic view; prosperous and powerful country; Occident; golden age prophecy

编辑 张 莉